UMAC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1 期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 （中文版）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1 期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 （中文版）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Copyright © International ICOM Committee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umac.icom.museum

Graphic edition: Gina Hammond

ISSN 2071-7229

每篇论文反映的都是作者的观点。论文附带的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图片附加的说明文字亦由作者提供。

封面图片：

David Daymirriŋu Maḻangi

1927—1999, Manharrŋu clan, Dhuwa moiety

worked Milingimbi and Ramingining

黑凤头鹦鹉羽毛扇，1984 年

羽毛、蜂蜡和木材

49.0 厘米 x 34.5 厘米 x 1.5 厘米

由 D Mundine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征集，1984—1985 年购买自 JW Power 的遗产

悉尼大学 JW Power 收藏馆，当代艺术博物馆，PW1984.86

周泽荣博物馆，悉尼大学，澳大利亚

摄影：David James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UMACJ）是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主办，经过同行评议、公开征稿的在线期刊。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即将策划的主题，或是想在投稿之前提出一个可供讨论的主题，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umacjeditor@gmail.com

UMACJ EDITORIAL BOARD 2020-2021

Kate Arnold-Forster | Direct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Hugues Dreysse | Director, Jardin des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France

Akiko Fukuno | Acting Director and Curator,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Hachiro Yuasa Memorial Museum, Japan

Margarita Guzmán | Curadora y Directora del Museo, de la Universidad del Rosario, Colombia

Gina Hammond | Manager, Psychology Test Library,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Lyndel King | Director Emeritus, Frederick R. Weisman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Alistair Kwan | Lecturer, Centre for Learning and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Marta Lourenço | Director,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Science, University of Lisbon, Portugal

Ing-Marie Munktell | Retired, previously Director Gustavianum, Uppsala University Museum, Sweden

Barbara Rothermel | Director, Daura Gallery & Associate Professor, Muse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Lynchburg, USA

Steph Scholten | Director, The Hunterian,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Andrew Simpson | Library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 Chair of Editorial Board, UMACJ

John Wetenhall | Director,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useu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USA

UMACJ（中文版）

策　划 / 李明斌　郭　骥
翻　译 / 骏　仁　肖福寿
编　审 / 刘志强　郁　慧
排　版 / 谭　茜
审　校 / 邵文菁

上海大学博物馆
中国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 南陈路 333 号，200444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UMACJ）中文版获得国际博物馆协会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授权
项目得到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上海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支持

目 次

高等教育行业经历了纷扰与混乱的一年
Andrew Simpson, Marta Lourenço 6

活化人类学档案：阿尔弗雷德 • 哈登的托雷斯海峡群岛古老习俗研究日志
Anita Herle,Jude Phil 12

思如泉涌：新冠疫情期间的策展与展陈设计
Ann Carew 20

可视化有“生命”的人类学藏品：重构照片中的“社会生活”并形成全新认知
Siti Sarah Ridhuan 28

一项全新的人类学藏品合作研究：通过播客沟通档案馆与当地社区
Jodie Kell,Steven Gagau 37

通过调解解决博物馆涉及的文化财产争端
Helen Shurven 46

日本理工类大学博物馆的实物交互实践
Sayuri Tanabashi 51

编辑社论

高等教育行业经历了纷扰与混乱的一年

Andrew Simpson, Marta Lourenço / 文
骏仁 / 译

2020 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的爆发，整个社会陷入纷扰与混乱，成为历史性的“分水岭”。疫情暴露了全球化供应链的各种系统性问题，众多企业倒闭，很多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高等教育机构等诸多社会性组织也面临生存挑战。在这些纷扰与混乱的背后，是全球政治环境日益紧张，经济实力错综变化，社会不平等问题愈发普遍且加剧，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导致全球生存危机，以至于很多人开始担心人类的未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行业同样面临各种威胁和挑战。许多地方的大学被迫直接转向远程在线教学。考虑到近距离接触的传染威胁，这项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得不取消所有课程项目。当然，在学术界都开始转向商业化且无休止追求财务可行性的 21 世纪，这并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由于疫情导致的紧急状况，留给学校转到线上教学模式的时间非常有限。有人认为，是疫情迫使高等教育行业加快面对本以为可以缓慢解决的问题，以至于有人说这个行业在几个月内完成之前需要用 10 年才能解决的事情（ANDERSON 2020）。突然之间，很多几乎没有线上教学经验的教师都被要求调整教程，开发新的教学方法，以应对学生需求的变化。

除了对教学产生显著的影响外，疫情的影响也蔓延到研究领域，包括实验室工作受到限制，数字化应用和开展虚拟合作的需求提升。对于大学博物馆而言，在藏品实物展示受限的情况下，需要为研究人员和普通观众提供数字访问的方式，作为公众参观实体展示空间的替代方案。至少在应付这些挑战方面，大学与非大学博物馆之间并没有很大区别。当然，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不同高等教育馆藏机构的资源和开发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并非所有大学博物馆和馆藏机构都能在疫情爆发时提供数字访问。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作为大学博物馆和藏品领域的专业协会，也面临着突然改变做法的挑战。较早让我们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是无法按照原计划在悉尼大学新建的周泽荣博物馆（Chau Chak Wing Museum）举行 2020 年度会议（SIMPSON & ELLIS 2019）。鉴于社会、经济方面的种种限制，以及无法预知国际旅行何时能恢复正常，我们不得不取消了原定的会议。2020 年 11 月 18 日面向公众开放的周泽荣博物馆是悉尼大学一座新建的博物馆和全新的文化场馆，汇聚了多种学科的不同收藏。在被迫取消会议的时候，筹备工作已经非常详尽，我们也已收到并正在审核大量精彩的提案。这是我们第一次取消年度会议，但愿也是最后一次。

悉尼会议的主题，是回顾与反思 UMAC 作为国际博协下属的专业委员会在过去 20 年间走过的历程，同时畅想未来。我们希望通过会议探讨以下的具体问题：博物馆及其藏品能否代表当今大学机构的 DNA 基因？当今的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能否成为高等教育文化生产的核心驱动力？大学的领导者是否将博物馆和收藏事业视为大学的核心业务？高等教育领域的博物馆及其收藏工作是一门新兴的专业吗？从事收藏工作的大学工作人员，现在是否被全球专业博物馆领域视为业内人士？

针对上述问题，全球的大学、博物馆以及收藏方面的专业人员给予了热烈回应，我们从 30 个国家收到了 130 份回复。虽然新冠病毒疫情让人们无法面对面交流，但我们希望通过这份《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让大家看到前述的大部分内容，本刊目前正在公开征稿，并争取各类文献检索系统的认可（LOURENÇO et al. 2017, SIMPSON et al. 2019）。本期内容包括不同的文献来源，其中有的是原本将在悉尼会议上交流的，有的源于早些时候即 2019 年日本京都和东京召开会议时的论文，还有一些来自我们的业界同行。

随着隔离和居家办公成为 2020 年上半年的全球常态，人们无法进入工作场所，UMAC 的所有业务也不得不改为线上模式。通过“居家的大学博物馆”（University Museums from Home）项目，处于新常态的人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站分享经验。尤其是讨论如何应对居家工作、保持联系和维护团结的挑战。来自世界各地的回复很有意思，有人提出新的环境戏剧性地改变了工作时间，还有很多人提到所在大学目前如何开发混合形式的远程教学，以及在线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未来能在本刊中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

对于 UMAC 而言，YouTube 频道也是应对疫情的重要工具之一。我们利用这一工具首次在线上召开年度大会，会议期间无投票权的成员也可通过 YouTube 频道观看会议直播，而有投票权的成员则需要利用 zoom 参与会议互动。毫无疑问，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的网络研讨会已无处不在。为了能提供在线频道更多内容，我们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发起“封城经验”（Lockdown Lessons）系列网络研讨会。该系列共包含 4 场会议，每场会议都在不同时间重复召开，目的是照顾位于不同时区的大学博物馆，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全球同业者的参与度。系列研讨会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非正式的，其设计宗旨是让同行之间有机会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验。

“封城经验”网络研讨会有 4 个特定主题。主题之一是如何应对重新开放，具体内容涵盖需要实施的安全措施、部分或全部重新开放，以及校园的出入管制情况。主题之二是如何重新开放馆藏，为需要学术研究的所有专业人士提供访问权限。主题之三是数字化转型，主要探讨大学博物馆已经做好哪些准备，以及应对技术、后勤和内容方面的挑战。系列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学生与在线教学，主要探讨在线的实物导向教学面临哪些挑战？学生如何应对相关变化？在线教学可能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做好哪些准备？得益于 YouTube 频道，我们制作了所有上述会议的视频并在线提供会员和非会员免费观看。除前述外，系列网络研讨会的另一项功能是为聚合资源提供活动中心。

尽管我们已经根据防疫需要，对工作方式和性质进行调整，然而疫情对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还远不止如此，很多严重的问题尚未完全浮现。举例来说，一些大学的诸多活动都依赖于留学生的学费，而没有了国际学生，将对其财务健康产生严重影响（THATCHER et al. 2020）。可以合理预期的是，随着财政问题日益突出，很多人又会质疑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的价值，认为并非是大学的核心业务。这其实是个老问题，早在大约 20 年前，UMAC 的创始人就是因为看到这一问题，才迫切呼吁同行学会向大学领导宣传藏品的价值（NYKÄNEN 2018）。假如某些大学真的像预期的那样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大学博物馆可能不得不列举之前提到过的那些论点，来确保自己在校园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得不再次进行本以为已经结束的斗争。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有些大学或许可能出售部分艺术类藏品以获取急需的资金。

受到疫情的影响，许多大学被迫重新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包括大幅调整课程和快速推进数字学习。为了能在高等教育市场中继续生存，不少大学都选择了裁员，其中包括临时员工和长期员工。有人认为前述举措早就应该实施，疫情只不过是加速了行动的进程。另外，疫情导致的经济影响是全球性的，并且可能持续很多年，影响当前乃至未来整整一代的学生。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AUCEJO et al. 2020）显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13% 的学生延迟毕业，40% 的学生失去就业、实习或其他机会，29% 的学生调低了自己在 35 岁前的收入预期。

施莱歇（Schleicher，2016）有一句名言：“我们要让毕业生能够胜任尚未出现的工作，学会使用尚未发明的技术，有能力解决尚未出现的社会问题。”现在看来，他的这番话颇具预言性。在疫情面前，已经没人能预测未来的社会会如何变化，毕业的学生会面临怎样的就业境况。也许在未来的几年里，整个高等教育行业就会彻底改头换面！当然，也有国家在利用疫情做文章，以国家需要为名，进一步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

毫无疑问，大学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机构之一。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很多时候大学需要通过创造性地利用收藏资料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大学总要面对很多看似无解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还往往具有全球普遍性。纵观历史，这些做法通常也符合大学的核心价值，符合作为知识发现者和传播者的核心使命。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相互关联的，也是互为对立的，例如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物种灭绝、人口过剩、人与人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不公，等等。尽管曾经的社会动荡、战乱和全球性流行疾病没有摧毁高等教育这一行业，但是当前的种种危机，似乎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如果说新知识的快速持续开发是高等教育的推动力，那么这一领域的资料收藏从业者就有责任找到新的方法，用以传播新知识并推动基于实物的教学法。在每年的 UMAC 奖项获得者中，我们总能看到充分体现前述创造力的具体实例。要推动面向未来的教学法发展，大学博物馆和收藏机构需要贡献更多的创新力和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和创新精神也契合当下的需要，因为我们的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将面临疫情所带来的复杂的全方位影响。

有人提出，未来的人类必须兼具运用信息、数据和传媒三方面的素养，以及解决问题和沟通、协作、参与等能力。与以往相比，2020 年我们将迎来充满着更多不确定性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的从业人员愈加需要相互合作。此外，他们也需要与教育工作者、学生、研究人员、大学以外的博物馆，以及各种工商业单位展开合作，以便高效地获得有价值的教学和研究经验。

在这些过程中，我们作为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从业人员的协会，也许可以发挥最关键的作用，并为塑造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Simpson, Lourenço

参考文献

ANDERSON, V. 2020. A digital pedagogy pivot: 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e from an HRD perspective.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3 (4), 452-467.

AUCEJO, E. M., FRENCH, J., ARAYA, M. P. U., ZAFAR, B.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tudent experiences and expectation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1. 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20.104271

LOURENÇO, M., ROTHERMEL, B. & SIMPSON, A. 2017. Introduction: reevaluating the discourse on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9, 7-8.

NYKÄNEN, P. 2018. First steps in global advocacy: some perspectives on the formation of UMAC, an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ICOM.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0, 10-21.

SCHLEICHER, A. 2016. Teaching Excellence through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Policy Reform: Less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52059-en

SIMPSON, A., & ELLIS, D. 2019.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global change: A focus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n Australia in 2020. Australian Museums and Galleries Magazine 28 (1), 17-19.

SIMPSON, A., FUKUNO, A. & MINAMI, H. 2019.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1 (1), 9-12.

THATCHER, A., ZHANG, M., TODOROSKI, H., CHAU, A. WANG, J. & LIANG, G. 2020. Predicting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13 (9), 188.

活化人类学档案：阿尔弗雷德 • 哈登的托雷斯海峡群岛古老习俗研究日志

Anita Herle, Jude Philp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在我们大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有大量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人类学资料，作者大多是早期的田野工作者。一项长期合作项目的目标，是出版阿尔弗雷德 • 哈登（Alfred Haddon）于 1888 年和 1898 年在托雷斯海峡群岛（Torres Strait）和新几内亚（New Guinea）东南部进行探险研究时完成的日志手稿（HERLE and PHILP eds. 2020），揭示哈登研究背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岛民对他记录古老习俗工作的积极贡献。通过重新活化人类学档案，将能凸显早期人类学藏品在推动学术研究和社群参与方面所具有的持续价值。

19 世纪末期，人类学是一门随着殖民扩张而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早期研究者从田野现场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如今都被存放在大学的档案馆和博物馆。尽管这些早期工作的指导理论看似已经过时，但近期合作完成的成果表明，相关的档案和馆藏依然具有深远价值。当年偏向实证的研究风格以及颇具个人色彩与风格的实地工作经历，都让相关人类学藏品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包括提供给学者和原有社群加以研究，并作为教学和对外服务的资源。

出版弗雷德 • 哈登于 1888—1898 年在托雷斯海峡群岛和新几内亚东南部进行实地研究的日志手稿是一个长期项目，能够凸显早期人类学档案对于学术研究和社群参与的持久价值（HERLE and PHILP eds. 2020）。项目目前仍在进行之中，整理者对哈登的事业有着深入了解，同时也拥有在相关地区工作 20 多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对细致的档案资料和针对藏品的研究。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哈登当年造访过的托雷斯海峡群岛岛民族群的后裔也参与了本项目的工作，并提供了参考性的意见。

哈登在学术界和岛民群体中的知名度，源于他对托雷斯海峡群岛的开创性探索。作为来自剑桥大学的自然科学家，1888 年哈登前往托雷斯海峡群岛开展海洋生物学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在这段时间里对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产生兴趣。他深入岛民族群，热衷于对当地文化的研究。岛民中的长者和哈登都感觉到当地的传统信仰和习俗正在受到威胁。为了挽救这些传统习俗，哈登于 1898 年以剑桥人类学探险队领队的身份回到托雷斯海峡群岛。探险队的 7 名队员分别来自不同的专业，并且肩负不同的目标，意味着人类学研究首次全面拓展到包括当地习俗和信仰、生理学、实验心理学、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在当地有威望的岛民的帮助下，探险队成功收集到大量信息和资料。哈登的另外两次探索都包含了针对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人群的比较研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除了档案以外，哈登还收集了各种其他藏品，包括绘画、实物、实景照片、录音、胶片、动植物标本以及人类遗骸。相关的探险报告（1901—1935）共分为 6 卷，披露的大量数据至今仍被视为在当地开展研究的基础性参考资料。对于当地族群的直系后裔和文化传承者来说，这些资料始终具有极高的价值，除了为当地艺术家提供灵感外，还被广泛用于对当地岛民习俗和原住民所有权认定的参考依据 （Mabo, 3 June 1992; Torres Strait Sea Claim Cases, 2010, 2013）。

哈登及其探险队的详细记录之所以有着特殊价值，其原因是岛民们曾经直接且积极地协助他们记录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哈登喜欢明确指出内容的具体出处，包括在探险报告中逐字引用岛民的话。他还曾将出版的图书寄到托雷斯海峡群岛，并在当地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哈登的日志手稿包括 120 多幅精美的插图，以及他所观察和经历事件的详细描述。通过一系列的信件，他将日志内容寄给在剑桥的妻子范妮（Fanny），供其参考和保存。尽管日志内容也涉及哈登感兴趣和参与过的海洋生物学、地质学和地理学工作，但他的这份手稿主要还是侧重于 19 世纪末有关岛民和邻近巴布亚民众的生活。哈登有意识地研究和记录了殖民出现以前的信仰和活动的细节，这些信仰和活动似乎正在消失。他重点关注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记录当地原住民的传统礼仪、歌曲和舞蹈。哈登的日志专注于当地传统，同时也生动翔实地记录了岛民生活的点点滴滴。哈登通过个人的笔触，记录了殖民者、传教士和商人的活动，他的日志也因此成为反映世界性区域政治和社会状况巨大变化的重要记录。哈登的日志还充分反映了他在人类学学科形成时期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实践。凭借在托雷斯海峡群岛所进行的研究，哈登被任命为剑桥大学人类学的学科带头人。他和探险队的同事威廉•里弗斯（William Rivers）、查尔斯•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一道，成为英国为数不多的第一代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导师。与同时期的大多数人类学记录不同，哈登在日志中揭示了信息资料的来源和获取方法，以及与研究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背景。颇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哈登曾与书中提到的岛民进行深入互动，并同其中很多人逐渐成为能够相互信任的朋友。1888 年与 1898 年日志内容的显著差异则反映出当地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哈登研究进程的调整和与当地人关系的变化。通过日志中记述的他与岛民及合作者之间的密切互动，我们可以看到哈登当年所获得过的帮助、所经历过的挑战，以及他对研究期望目标所做过的调整。

对于当代的岛民来说，哈登的著作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记忆。其记录的细节、出处以及涵盖的范围进一步凸显价值，并且当代岛民有意愿也有能力利用哈登留下的优秀资源成功解决民族自决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托雷斯海峡的岛民亲自造访剑桥大学，参与研究哈登收藏的档案和藏品（HERLE 2003；PHILP 2018）。1998 年是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人类学考察 100 周年纪念，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Museum of Archaeology & Anthropology，MAA）为此举办了纪念展览，而托雷斯海峡群岛与剑桥大学之间的互访与交流在那之后愈发频繁（HERLE and PHILP 1998, HERLE and ROUSE eds. 1998）。博物馆收藏的托雷斯海峡群岛手工艺品也曾在澳大利亚举办巡展，岛民主导了这些展览的组织（MOSBY and ROBINSON eds. 1998, PHILP 2001）。2011 年，博物馆归还给托雷斯海峡群岛近 1 000 张实地环境的照片和数字副本，并与当地的文化领袖签署了谅解备忘录（HERLE, PHILP and DUDDING 2015）。

图 1 海滩野餐照片。从左至右分别为哈登（坐者）、帕西（Pasi）、雷（Ray）、科里巴（Koriba，不确定）、卡诺夫人（Mrs Canoe）、无名青年和波帕西（Poi Pasi，蹲者）。摄影：塞利格曼（Seligmann）或道尔（Dauar）（不确定），托雷斯海峡默里群岛（Murray Islands, Torres Strait），1888 年 5 月 14 日。MAA N.23140

虽然哈登的著作和摄影作品流传广泛，他的个人日志却一直没有走出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手稿陈列室。人们希望剑桥数字图书馆能够整理编目并将这批资料数字化，但由于其中提及了某些家族先人的个人信息，按照与当地社群的协议，最终决定先允许原籍家庭和社群查阅日志，作为未来更广泛传播的尝试环节。

2016 年，我们在当地考察期间首次讨论了日志的出版计划。我们会见了岛民代表，他们分别来自四大主要岛民社群：马布亚格的戈穆加尔（Goemulgal on Mabuyag）、梅尔的梅雷姆（Meraim on Mer）、伊玛的库尔卡尔加尔（Kulkalgal from Iama），以及穆拉拉格的考拉雷格族（Kaurareg Nation on Muralag）原住民代表（aboriginal representatives），其中包括当年与哈登合作过人士的直系后裔。我们为每个社群准备了演示文稿，重点介绍采集于他们所在岛屿的资料。我们的演示内容受到广泛欢迎并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探讨，但当地人总体还是保持审慎的态度。他们表示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时间进行考虑，之后才能

就出版事宜做出决定。作为潜在的作者和编辑，我们只提出了两项条件：如果决定出版，那么出版物就必须收录所有的内容材料；并且，一旦出版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就不能再撤回有关出版的决定。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致力于转录日志，并将相关内容的纸本副本寄给托雷斯海峡的族群和社群代表。双方的沟通时断时续，直至 2017 年年中，我们终于获得岛民代表一致认可，得以继续推进该项目。鉴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周边岛屿的互联网连接信号较差，个人电脑的数量不足，我们认为必须准备好可以随时分发给社群的纸质副本。岛民们则非常支持我们根据哈登的记述寻找到剑桥，以及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的不同机构所收藏的他的作品，包括如何才能看到这些藏品的详细说明。另一方面，岛民也一致反对我们最初提出的让岛民谈论哈登的工作详情以及有关先人的提议，他们认为这会让项目过于“复杂”和“偏离哈登”，而关于具体位置和个人的信息具有隐私性，不适合放入正式出版的作品中。

2018 年 10 月，我们返回托雷斯海峡，报告项目的进展和出版计划。与 2016 年时一样，我们仍然邀请了四大岛民族群的代表来参加小规模的会议，但其后的演讲则面向更多的岛民。我们针对日记的讨论，主要围绕当代关注的重点，包括通过更多了解过去，以重振和传习传统文化，在知识分配的过程中维护文化原则，以及在社群内部和社群之间针对知识、海洋和土地所有权及其他权利的探讨。我们还向托雷斯海峡地区管理局的理事会成员正式介绍了我们的出版项目，并且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鉴于可以采用的视觉素材非常多，在与悉尼大学出版社进行协商后，我们决定使用高质量纸张进行全彩印刷。能够得到出版社的同意并不容易，因为如今电子图书逐渐成为主流，而印刷品只能按需提供。最终我们的出版物将包括哈登探访托雷斯海峡和新几内亚期间撰写的所有日志，所有原始图纸和 200 张相关的实地照片、原住民画作以及部分收藏品的图像。日志内容附带大量的介绍性说明文字和脚注，这样能让不同背景的读者迅速了解其中所涉及的不同人物、地点和事件。岛民合作者奈德 • 大卫（Ned David）〔海洋与陆地委员会（Gur a Baradharaw Kod）主席、托雷斯海峡岛民区域教育委员会（Torres Strait Islander Regional Education

图 2 与梅里安 • 埃尔德斯（Meriam Elders）成员一起探讨哈登的日志和照片，（左起）塞加 • 帕西（Segar Passi）、布鲁斯 • 帕西（Bruce Passi）、裘德 • 菲尔普和罗恩 •B• 戴（Ron B.Day）。摄影：安妮塔 • 赫尔勒、梅尔（Mer），托雷斯海峡默里群岛，2018 年 10 月 29 日

Council，TSIREC）主席〕和悉尼大学历史系的利亚 • 莱亚吕 - 奇维希（Leah Lui-Chivizhe）分别撰写了前言和结语。

在全面研究档案、照片、手工艺品和录音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能够细致入微地了解 19 世纪末托雷斯海峡岛民和巴布亚人的生活，以及当年传教士、殖民代理人和商人对这个地区产生多大的影响。此外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当英国人将实地研究视为新兴人类学的关键研究方法的时候，哈登设立了哪些研究目标，采取了哪些实践方法，岛民们曾提供过哪些协助。本研究和出版项目的一项基本目标，始终是让更多人（尤其是哈登曾经探访过的当地社群）能够看到哈登的日志。我们获得的外部支持分摊了项目的部分费用，但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资助能让我们向学校、图书馆、原住民社群机构和贡献者免费提供出版物。对于岛民以及在托雷斯海峡地区（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部）工作的跨学科研究人员来说，哈登日志将成为极有价值的资源。正如结语所述“这些日志将在岛民和其他群体中创造新的故事和历史，而它们真正的价值也将在这些故事和历史中得以体现”（LUI-CHIVIZHE，2000: 332）。

安妮塔 • 赫尔勒（Anita Herle）和裘德 • 菲尔普（Jude Philp）合著的《传统文化记录：阿尔弗雷德 • 哈登 1898 年和 1888 年在托雷斯海峡群岛和新几内亚的研究日志》（*Recording Kastom: Alfred Haddon's Journals from his Expeditions to the Torres Strait and New Guinea, 1898 and 1888*）将由悉尼大学出版社（网址：sydneyuniversitypress.com.au）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出版。

致谢

作为作者，我们要感谢托雷斯海峡岛民在《传统文化记录》项目的

图 3 哈登日志中的 wai-tutu kap（锯鳐舞，saw-fish dance）草图。Waiben 岛（又名星期四岛，Thursday Island），托雷斯海峡，1888 年 11 月：69

研究和准备过程中所提供的建议、帮助和热情款待。此外我们还要感谢主编安德鲁•辛普森（Andrew Simpson）鼓励我们发表这篇论文，感谢托雷斯海峡地区管理局 （Torres Strait Regional Authority，TSRA）、蒙纳士大学原住民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onash Indigenous Studies Centre）、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研究所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AIATSIS）以及哈登家族（Haddon family）对本出版物的慷慨支持，是他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向原住民社群图书馆、档案馆和社区中心免费提供出版物。

参考文献

HERLE, A. 2003. Objects, Agency and Museums: Continuing dialogues between the Torres Strait and Cambridge. In: Museums and Source Communities, eds. L. Peers Brown & A. Brown, London: Routledge, 194-207

HERLE, A. & J. PHILP. 1998.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an exhibition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1898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hib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HERLE, A. & S. ROUSE (eds.) 1998. Cambridge and the Torres Strait: Centenary Essays on the 1898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RLE, A., J. PHILP & J. DUDDING. 2015. 'Reactivating Visual Histories: Haddon's photographs from Mabuyag 1888, 1898.' In: Goemulgaw Lagal eds. I. MCNIVEN & G. HITCHCOCK (1): 253-288.

HERLE, A. & J. Philp (eds.) 2020. Recording Kastom: Alfred Haddon's Journals from his Expeditions to the Torres Strait and New Guinea, 1898 and 1888.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LUI-CHIVIZHE, L. 2020 Epilogue: Reflections. In: Recording Kastom: Alfred Haddon's Journals from his Expeditions to the Torres Strait and New Guinea, 1898 and 1888, eds. A. HERLE & J. PHILP,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331-2.

PHILP, J. 2001. Past time: Torres Strait Islander material from the Haddon Collection, 1888-1905. A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exhibi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nberra: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ROBINSON, B. & T. MOSBY. 1998. Ilan Pasin (this is our way): Torres Strait art. Cairns Queensland: Cairns Regional Gallery.

联系方式

Dr Anita Herle is Senior Curator for Anthropology and Reader in Museum Anthropology at the Museum of Archaeology &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ddress: Downing Street, Cambridge, UK, CB4 1AL. ach13@cam.ac.uk. maa.cam.ac.uk.

Dr Jude Philp is Senior Curator for the Macleay Collections of the Chau Chak Wing Museum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University PI, Camperdown NSW 2006, Australia. jude.philp@sydney.edu.au www.sydney.edu.au/museum

关键词： Torres Strait,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Alfred Haddon, archives,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思如泉涌：新冠疫情期间的策展与展陈设计

Ann Carew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本文介绍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MIT）基于其设计类藏品的实践式学习（practice-based learning），以及我们如何克服疫情的影响坚持开展相关课程。文中重点介绍了“莱斯·梅森：思如泉涌”（Les Mason Mindplay），一个由大学传媒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设计档案馆（RMIT Design Archives）合作实现的具有创新性的有趣的数字展览。

引言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设计档案馆（RMIT University's Design Archives，RDA）收藏着 20 世纪以来在墨尔本创作的各类设计作品。无论数据还是实物，设计档案馆的藏品都体现了墨尔本这座设计之城曾经和时下的设计实践，以及大学在培养设计师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学生们可以利用档案馆的馆藏学习各种设计流程，涵盖了建筑学、汽车设计、时装和纺织品设计、家具设计、平面和传媒设计与独立出版、工业和产品设计、室内设计，以及景观设计等相关专业。今天，随着档案馆所在的大学开始推行基于实践的学习项目，藏品愈发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档案馆实施的课程包括传播学设计（策展与展陈的传媒设计）、建筑学（设计中的批判性与策展实践）和工业设计（设计黑客）。在调阅某位设计师的档案后，学生可以参与合作开发展览、创建展示对象、设计展览标识，磨炼他们的项目管理技能、设计阐释模式与社交媒体策略。上述课程通常安排现场实践，场地包括设计档案馆的 Active Archive 和大学的设计工作室。这些课程对学生有以下帮助：为学生群体提供实践机会；锻炼档案管理和研究技能；有机会接触到原始素材并与专业设计师会面；能够与大学的专业人员（例如策展、档案和展览项目的负责人）合作并获得他们的反馈。对档案馆而言，也能从上述课程中得益：通过创新性的项目和活动活化馆藏（HAYLOCK 等，2018）；与学生、学术人员、设计师以及捐助者建立伙伴关系。

在这一学术项目的影响下，诸多专业教师、当代设计师和艺术家开始关注设计档案馆的收藏。[1] 本文中，我们将分析一个最近成功提交的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项目。自 2017 年以来，我们与设计学院传媒设计硕士课程的师生合作，共同开展了名为“策展与展陈传媒设计”（Curating and Exhibiting Communication Design）的实践性协作课程。课程时长是一个学期，报名参加的学生可以调阅设计师的档案资料，之后根据研究成

1 2017 年，“Archivia, 2017”，工作室负责人苏茜 • 泽祖拉（Suzie Zezula）和布拉德 • 海洛克（Brad Haylock）；2018 年，“拯救地球的宇宙飞船”（Save Spaceship Earth），工作室负责人诺埃尔 • 韦特（Noel Waite）和苏茜 • 泽祖拉；2018 年，“这不是一个展览”（This is not an Exhibition），工作室负责人齐加 • 特斯腾（Ziga Testen）；2019 年，“驾驶的乐趣”（The Joy of Motoring），讲师和项目负责人霍普 • 卢姆斯登 • 巴里（Hope Lumsden Barry）；2020 年，“斯蒂特很及时”（A Stitt In Time），工作室负责人费恩 • 德维（Fayen D'Evie），会议讲座克里斯 • 梅瑟（Chris Mether）。

果提出并执行协作设计项目。以往参加课程的学生提交的成果包括实体展览和各种相关附属元素，包括导向标识、展品文字解释和指示牌、目录、社交媒体活动，以及藏品（2019 年更新）观摩。学生偶尔会将档案资料用于实物展览，但更多时候是重新想象这些资料并用以打造全新的设计形式。

图 1 “档案馆，2017：策展与展陈传媒设计”，苏茜 • 泽祖拉和布拉德 • 海洛克，工作室负责人，RMIT。学生根据 RMIT 档案馆外立面设计的邀请函

图 2 传媒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观 RMIT 设计档案馆，2017 年 10 月，安 • 卡鲁（Ann Carew）拍摄

图 3 档案馆展览开幕日当晚，学生在亚历克斯 • 斯蒂特（Alex Stitt）的肖像前合影，肖像中包含有链接至 RMIT 设计档案馆在线藏品数据库的二维码，2017 年 10 月，安 • 卡鲁拍摄

Carew

近期的项目工作

每个学期档案工作的重点必须在开学之前甚至是前一个学期就确定，以便档案管理员西蒙尼 • 鲁尔（Simone Rule）能预留出足够的时间准备馆藏资料以供查阅，并在必要时对藏品资料进行数字化和分类。2019 年底，在与设计史学家、传媒设计硕士课程负责人诺埃尔 • 韦特（Noel Waite）博士商议后，我们决定将课程的重点放在艺术总监和平面设计师莱斯 • 梅森（Les Mason，1924—2009）的档案研究上，因为他曾在澳大利亚开创了全新的以品牌和包装设计为核心的广告模式。

2020 年 2 月，西蒙尼 • 鲁尔和我一同会见了新任命的讲师费恩 • 德维（Fayen d' Evie）博士。德维是一位艺术家、作家、策展人，拥有决策支持系统和策展实践方向的双博士学位，她曾担任“策展与展陈传媒设计”课程相关工作室的负责人。我们与德维的首次会谈主要围绕档案馆的定位以及如何才能让实体展览更契合我们的建筑构造和机构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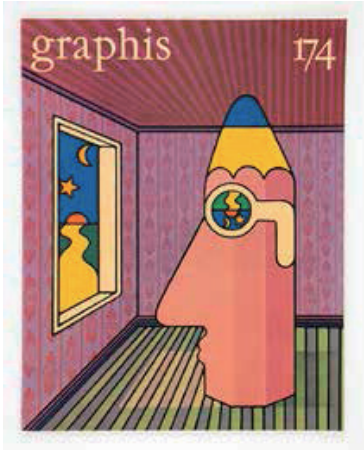

图 4 写真 174，1974/75，RDA 馆藏，亚历克斯和帕迪 • 斯蒂特（Paddy Stitt） 捐 赠，2010，0105.2010.0008，封面设计：莱斯 • 梅森

第一堂课安排在 3 月的第一周，德维带领学生参观了大学的设计档案馆，近距离欣赏莱斯 • 梅森一生作品的选集。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到场。有些国际学生由于政府管制而必须隔离，还有些人则主动选择待在家里，因为他们不希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是与他人有任何近距离的接触。

随着新冠疫情影响开始加剧，显然已不再适合采用之前工作室的团队工作模式来进行实体展览的设计与布展。在这种情况下，德维提出将课程的重点转向在线展览设计。她指出，有关在线策展的创新与数字档案展览的设计，我们有很多先例可以借鉴，学生们也将拥有足够的创意空间。[2] 我们一起探讨了如何在转到线上后仍然让学生们保持参与作为课程特色的协作学习和团队合作。至 3 月 23 日，为应对疫情和保护周围社区的安全，设计档案馆同时对工作人员和观众关闭。再到 3 月 30 日，德维开始在线教授她所有的课程，学生们则需要使用 RMIT 的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Canvas 来听课和开展团队工作。

2 费恩 • 德维致安 • 卡鲁、西蒙尼 • 鲁尔和诺埃尔 • 韦特的通信， 2020 年 3 月 18 日

为了让大学设计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能够与学生互动，德维通过 Microsoft Teams 建立了一个群组 Epic Cure，让学生可以在其中分享视频内容和数字化工作的蓝图。[3] 大家之前都没有使用过 Microsoft Teams，实践证明这是很有效的工具，有助于提升个人与团队的参与度，让教师有更多时间思考学生们的想法并提供书面反馈。

之后的整个学期里还有很多次的跌宕起伏。在传媒设计硕士专业高级讲师、项目管理员诺埃尔 • 韦特博士看来，我们将可能需要两个学期才能完成的任务压缩在一个学期里完成了。[4] 除了要适应在线学习工具和项目管理的多变性以外，大学的工作人员和学生还需要应对在线课程的新模式，掌握快速变化的工具。

3 月下旬，学生们向设计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介绍了他们的展览理念。正如德维所认为的，由于专业人员的参与，让处于新的虚拟环境里的学生产生了“变得真实”（made it real）的感觉。[5]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学生们以设计师的身份分析藏品，对梅森的设计过程、纸料选用、色彩和排版，以及文字和图像的整合方式一一作了回应。学生们采用了很多有趣的互动方法，访问者的在线体验是他们首要的考虑因素。学生们尊重莱斯 • 梅森的设计内容。第一批提交的视频体现了学生对数字展览设计相关的公共和商业案例开展广泛研究，并且深入探索了莱斯 • 梅森作为艺术家和设计大师的实践活动。项目的新闻稿也是学生编撰的，叙述了作为美国人、同时也是澳大利亚人的莱斯 • 梅森在澳大利亚传媒设计领域的地位。

“梅森的作品，极大推动了平面设计师这一职业在澳大利亚的出现与发展，并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设计工作室的成形，奠定了重要基础……”

“莱斯 • 梅森于 1961 年从美国移民到澳大利亚。他最出名的工作，应该是 1966 年至 1979 年间为 77 期 *Epicurean*——介绍澳大利亚美食和葡萄酒文化的双月刊杂志担任设计与创意指导。除此以外，梅森还为 A.R.C

3 费恩 • 德维致安 • 卡鲁，电子邮件，2020 年 3 月 30 日
4 诺埃尔 • 韦特：与安 • 卡鲁、费恩 • 德维和安 • 卡鲁有关于项目回顾的探讨，Microsoft Teams，2020 年 6 月 12 日
5 费恩 • 德维：与安 • 卡鲁关于项目回顾的探讨，Microsoft Teams，2020 年 6 月 12 日

Weldmesh、The State Bank 等企业设计品牌推广资料，包括海报和宣传册，其中的图形设计具有不拘一格和兼收并蓄的特点。这些都是通过在线调研得出的结果。”[6]

对于设计档案馆来说，如何让学生们访问藏品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在整个项目期间，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作人员都完全无法前往设计档案馆。所幸的是，我们选择了一份记录翔实的档案。不过，大家很快就发现在线展览和网站需要更多的数字资料。西蒙尼 • 鲁尔向大学提出申请，要求返回校园。学校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前提是他只能在档案馆里待上一天。

图 5 “思如泉涌：莱斯 • 梅森”新闻稿，2020 年 6 月由策展与展陈传媒设计专业硕士课程学生设计

在学生与设计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和制作团队协调员进行第二次在线互动后，我们获得了与品牌和营销相关的设计蓝图，其中包括登录页面、故事页面、设计播放和电子商务页面。其中的品牌手册和标识让人眼前一亮，表明大家的设计理念正在向着一个方向汇聚。在项目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体现着民主性，即通过讨论甚至投票来进行选择，例如确定在线商店的产品。到了 5 月，学生们建立了一个 Instagram 账号（@mindplay.lesmason），发布莱斯 • 梅森的原创设计，以及从中获得灵感而开发的衍生艺术品。在这里，还能看到学生为设计档案馆前窗设计的概念方案，我们曾希望付诸实现，但由于墨尔本的第二次封城，我们无法进入校园安装窗户图形。设计档案馆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户上分享了学生的设计，并通过大学的文化通讯发布了展览讯息。

项目网站 mindplaylesmason.com 于 6 月 1 日上线，之后将持续运营 12 个月 。网站共分为 4 个版块：“关于我们”（About）、“观点”（Perspectives）、“思维游戏”（MindGame）和“思如泉涌商店”（Mindplay Store）。其中“观点”版块呈现了展览相关内容，栏目标题包括“现代艺术”（Modern Art）、“艺术总监”（The Art Director）、“从加利福尼亚到维多利亚”（From California to Victoria）、“墨尔本设计与瑞士风格”（Melbourne Design & Swiss Style）；“思维游戏”版块是一个设计平台，观众可以在这里发挥自己的设计天赋，根据莱斯 • 梅森的作品制作邮票和明信片；“在线商店”版块展示了学生在梅森风格的影响下设计的实物和

6 费恩 • 德维：与安 • 卡鲁关于项目回顾的探讨，Microsoft Teams，2020 年 6 月 12 日
7 Mindplayles Mason，https://mindplaylesmason.com/（引用时间 2020 年 6 月 19 日）

数字产品。诸如帆布包、茶巾、海报，以及手机壁纸、可下载字体等数字产品，这些都是对本项目的创新性补充。

图 6 “思如泉涌：莱斯 • 梅森”帆布包，由传媒设计硕士生为“思如泉涌”在线商店设计并拍摄，2020 年 6 月

图 7 策展与展陈设计学生的“思如泉涌：莱斯 • 梅森”项目宣传视频，2020 年 6 月

结语

在线商店的销售收益将被用以支持未来传媒设计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学习项目。在本学期的工作和学习中，学生和工作人员体现了非常出色的探索精神和创造力，他们在鼓励观众参与互动方面尤为值得称道。正如德维讲师最近做出的评价，“这群才华横溢的设计专业学生克服各种物质和情感方面的障碍，在新冠疫情期间坚持攻读硕士学位。面对众多不利情况，他们展现了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独创性和热情……[A]‘思如泉涌’项目通过跨越大洲、语言和时区的虚拟协作，实现了数字展览与设计师莱斯 • 梅森作品和创作经历的结合。”[8] 项目网站以新颖的当代时尚的形式展示相关档案。这是 21 世纪的我们，对 20 世纪著名设计师莱斯 • 梅森的精彩致敬，也是新冠疫情期间克服困难和不确定性，分享藏品的积极成果。

致谢

本文作者向传媒设计学院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致以谢意，包括项目管理员诺埃尔 • 韦特博士，讲师与项目负责人费恩 • 德维博士，以及所有参与项目的学生 Mario Jacinto Genoveza、Josef Horak、Nina May Gibbes、I-An Change、Arianne Navarro-Grau、Arias Schriber、Meixu Chen、Mendie Chen、Wenxi Chen、Meiying Lin、Lemeng Liu、Alexandra Jane Pettigrew、Jing Sun、Yao Xiao、Yue Yin 和 Xialou Zhang，他们在本学期的工作和学习中表现非常出色。项目还得到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设计档案馆管理员西蒙尼 • 鲁尔、大学文化制作协调员埃里克 • 诺斯（Erik North）为课程提供的支持。

在维多利亚州第二次因疫情封城期间，2020 年第 2 学期的传媒设计硕士课程并未中断。

参考文献

HAYLOCK, B., WAITE, N., WARDLE, D. & LAKE-HAMMOND, A., 2018, ‘Making public collections more public through design-led innovation in interpretation and engagement’, Melbourne: RMIT University

8 费恩 • 德维：@muckletimes，instagram 发帖，2020 年 6 月 17 日

网站

Mindplay: Les Mason: an immersive virtual exhibition. https://mindplaylesmason.com/ (accessed October 19, 2020).

A Stitt in Time: an exhibition on Alex Stitt. https://www.astittintime.com/(accessed October 19,2020)

联系方式

Ann Carew, Curatorial Officer, RMIT Design Archives

Address: RMIT Design Archives, RMIT University, GPO Box 2476, Melbourne, VIC, 3001

Email: ann.carew2@rmit.edu.au

关键词

University archives, design, practice-based learning, graphic Design, Communication Design, COVID-19, curatorial

可视化有“生命”的人类学藏品：重构照片中的“社会生活”并形成全新认知

Siti Sarah Ridhuan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本文提出应当将人类学资料超越“藏品”（collection）本身，重新绘制“社会生活”（social lives）的印迹，作为一种激发新的认知潜力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田野调查期间拍摄的照片可以作为外推深层信息的视觉切入点，建构此前因制度流程和实践脱节而丧失的重要情境关系。将人类学藏品重新定义为“社会性物品”（social objects），可以使之成为“有生命的藏品”（living collection），并且不断产生满足各原住民社群、机构和学术研究者需要的知识形式。

引言

虽然当前针对人类学藏品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其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保存（SCHULTZ 2014; JONES 2019），但藏品在知识生成方面的潜力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一直以来，机构在对收藏的人类学资料的认知和获取方式上，关注的总是实物的具体内容而非其本身的时空背景。仅从“收藏”的角度考虑，经常导致大量重复和相互关联的重要数据被忽视并最终丢失。以这种基本理论与普遍实践为依据形成的体制，导致各种材料被孤立对待，无法借由关系情境发现其更多的涵义与内在联系。一直以来，在访问、参与和合作过程中，这些藏品大多仍静静地躺在过去，而没有发挥出与当今和未来相关知识生成有关的潜力。

本文简要论证了人类学资料不只是“藏品”，而应根据关系情境重新绘制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路径[1]。以人类学照片作为切入点，我将展示活化这类资料的知识生成潜能，如何在原住民社群和不断发展的机构之间，从多个方面满足双方各自的和共同的利益需求。将人类学藏品视为“社会性物品”，是借鉴了阿帕杜莱（Appadurai）对文化之间交流的分析，即“对于正在交换的物品的价值，在认知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异”（APPADURAI 1986,14）。从这个论点出发，当物品在单一文化内部流通或是在不同文化之间流通时，依附在物品上的社会性共识也会发生转移。上述转变反映的是知识的分类和层次结构，这又影响到围绕相关藏品的交流、媒介、翻译与对话。除了阿帕杜莱的理论方法，科普托夫（Kopytoff，1986）则认为，利用传记分析模型能有效地解析物品的文化建构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将藏品视为拥有生活史和文化传记的社会性物品，能够有效确认其所反映和再现的意义、价值和用途在语境中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承认价值创造过程的偶然性，对于相互关系调和的依赖性，强调了收藏者、博物馆，以及藏品来源社群的参与作用（MORPHY 2020, 9）。最近，各种类型博物馆都开始采用这种方法，试图从关联的视角理解藏品的历史，并去除其殖民属性（GOSDEN & KNOWLES 2001；JOY 2009）。

1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人类学藏品研究。然而，如若将这一方法用于批判性分析其他类型的藏品或是博物馆藏品，应能进一步拓展整体研究的范围。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资料搜集

20 世纪澳大利亚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交织着各种学术话语、体制实施和政府管理的历史，由此提供了内涵深刻的数据层，有助于将人类学藏品置于社会生活轨迹的语境中。人类学在澳大利亚成为大学的专业学科，其强调搜集和分析数据的特定标准。学术研究依赖特定的知识话语体系和范式，其中关于“有效”（valid）数据（及其搜集方法）的概念，指导搜集记录资料和数据的相关领域（MORPHY 2020）。社会人类学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转变，是随着密集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发展起来的。调查期间研究人员会在社群里长期生活，试图与当地人建立关系并搜集各种形式的数据（PETERSON, ALLEN & HAMBY 2008）。这些数据包括客观存在的文化物品（手工艺品和艺术品）、视频音频记录、地图、家谱、田野笔记、其他文件和照片，捕捉到社群或族群所在的社会和文化世界中的各个方面。

如今，其中的一些资料被大学、博物馆或其他收藏机构所收藏，远离了与之相关的社群或族群。在这些材料流转过程中，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变化影响到物品的意义、价值和用途。如果资料本身被重新分类、孤立和分离，其关联性和完整的语境层次也会就此丧失。此外，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些资料在整个人类学学科和机构网络中的流通，避免受到更多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影响。政府为了管理原住民族群会强制实施相应的政策，许多政策的制定依据都来自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GRAY 2007； BENNET 等，2017）。开展人类学研究的机构部门和田野工作者也需要政府的资助和支持，尤其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他们的作用和意义也曾受到过挑战或批评（GRAY 2007）。今天的博物馆依然受到社会政治格局的影响。作为反映、复现和响应更为广泛的外在环境的机构（SCHULTZ 2014, 413），澳大利亚的博物馆藏品深陷于不断演变中的、与第一批原住民（First Peoples）有关的各类政府和公众议题。这些变化无论是过去的抑或是正在发生的，其语境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物品本身蕴含的知识。

以照片为“切入点”

与被机构归类为物质文化或艺术品的藏品相比，人类学田野调查过程中拍摄的照片通常被视为历史参考资料或相关记录。因此，这些物品在物理空间和语境上进一步远离与之相关的其他材料。这种征集和编目过程中的差异化，限制了当前与不同的资料来源社群开展获取、参与和制作方面合作的努力。尽管如此，这些摄影照片仍可作为有效的“切入点”，通过传记的形式将各种信息的流动轨迹重新置于时空背景之中。

爱德华兹（Edwards，2003）认为，摄影作品平行记录了同一时刻的信息、关联与认知。通过照片，我们有可能重构新的视角，看到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三大领域的交叉点，并产生新的认知。人类学田野调查期间拍摄的照片是附带了意义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社会性物品，体现了与观众之间“物质表现性和现象学的关系”（EDWARDS 2003, 90）。上述关系的存在超越了简单的内容和静态的“藏品”，反映的是当地和社会文化信息的视觉参考，允许不同机构和知识访问的路径权限。与其将照片置入不同层级的信息孤岛，不如将其视为档案记录、田野工作采集的物品和视觉图像，由此可基于不同的参考标准寻找到多义性数据的各种变化轨迹。

本文以人类学家罗纳德 • 伯恩特（Ronald Berndt）于 1939 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作为具体案例，简要介绍如何使用照片来重新映射关系情境，以及活化知识生成的潜能。罗纳德和他的妻子凯瑟琳（Catherine）是澳大利亚杰出的人类学家，他们在社会人类学领域，以及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艺术、福利和权利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伯恩特夫妇的职业生涯中，从 1939 年起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地方都对原住民开展过田野调查。除了田野笔记、记录族谱、绘制地图和拍摄照片外，他们在调查时还记录了原住民的歌曲并获得一些物品，这些后来都成为了他们的收藏品。1976 年藏品被正式捐赠给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之后于 1979 年开始在人类学研究博物馆（Anthropology Research Museum）对外展出，这座博物馆后来

更名为伯恩特人类学博物馆（Berndt Museum of Anthropology）。在南澳大利亚州的早期考察期间（1939—1944 年），伯恩特夫妇造访了这一地区的多个原住民定居点和社群。格雷（Gray，2019）翔实记录了伯恩特夫妇在此期间的田野调查活动，强调指出了解相关背景语境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层。在与各个政府机关和机构〔例如南澳大利亚博物馆（South Australia Museum）、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打交道的同时，伯恩特夫妇在认知上、政治上和后勤的种种条件框架的限制下，巧妙且务实地规划人类学研究和收藏活动。

1939年，罗纳德•伯恩特在默里布里奇（Murray Bridge）拍摄了一张“独木舟树”（canoe-tree）的照片，这份重新绘制的视觉地图反映了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多重价值、意义与用途。图 1 的上半部分展示的是出版、田野调查收藏、机构获取和机构之间交换的背景信息，这是照片最表层的轨迹。下方展示的是第二层信息，即照片与恩加林杰里（Ngarrindjeri）族人的文化知识的参考关系图，以及田野调查期间原住民社群成员向伯恩特夫妇提供的信息，包括祖先传说、歌曲、仪式、传统习俗以及家族关系和领土边界等，能从中找出许多相互关联的信息。

全新目标——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

这张简要的示意图采用了伯恩特夫妇于 1941 年和 1993 年出版的著作里的素材，以照片作为视觉切入，绘制了关联性和交叉点。将摄影作品视作理解不同关系网络里的社会性物品，我们可以基于各类人群、社群和机构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来发现多重意义、价值和用途的变化轨迹。置于更为广泛的知识生成和交流背景下，照片能在展现特定信息的同时，超越自身内容的边界。这种重构也指出，通过传记形式分析人类学藏品的方法，可以有效横跨历史、认识论和本体论领域。运用这种方法意味着基于整个流转过程中意义和价值的转变来认知相关物品，可以预期并适应当前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一方法重新定义了藏品、机构和行为主体，将其视为跨越多重流通、关联和空间的相互作用体，从中可以产生并行存在但非线性的新的认知。

标题中的“回顾过去”（looking back），是指通过示意图可以了解田野工作实践、征集策略、关系网络的相关信息，有助于重建体制层面经常会散落和丢失的背景内容。就内部而言，上述示意图提供了研究、管理和保护藏品的新视角，可以帮助解决长期存在的信息孤岛和数据不一致的问题。除了改善内部获取资料的途径外，那些参与人类学藏品工作的人员还可以发展对体制实践和理论的认知，从而基于藏品反映某些知识的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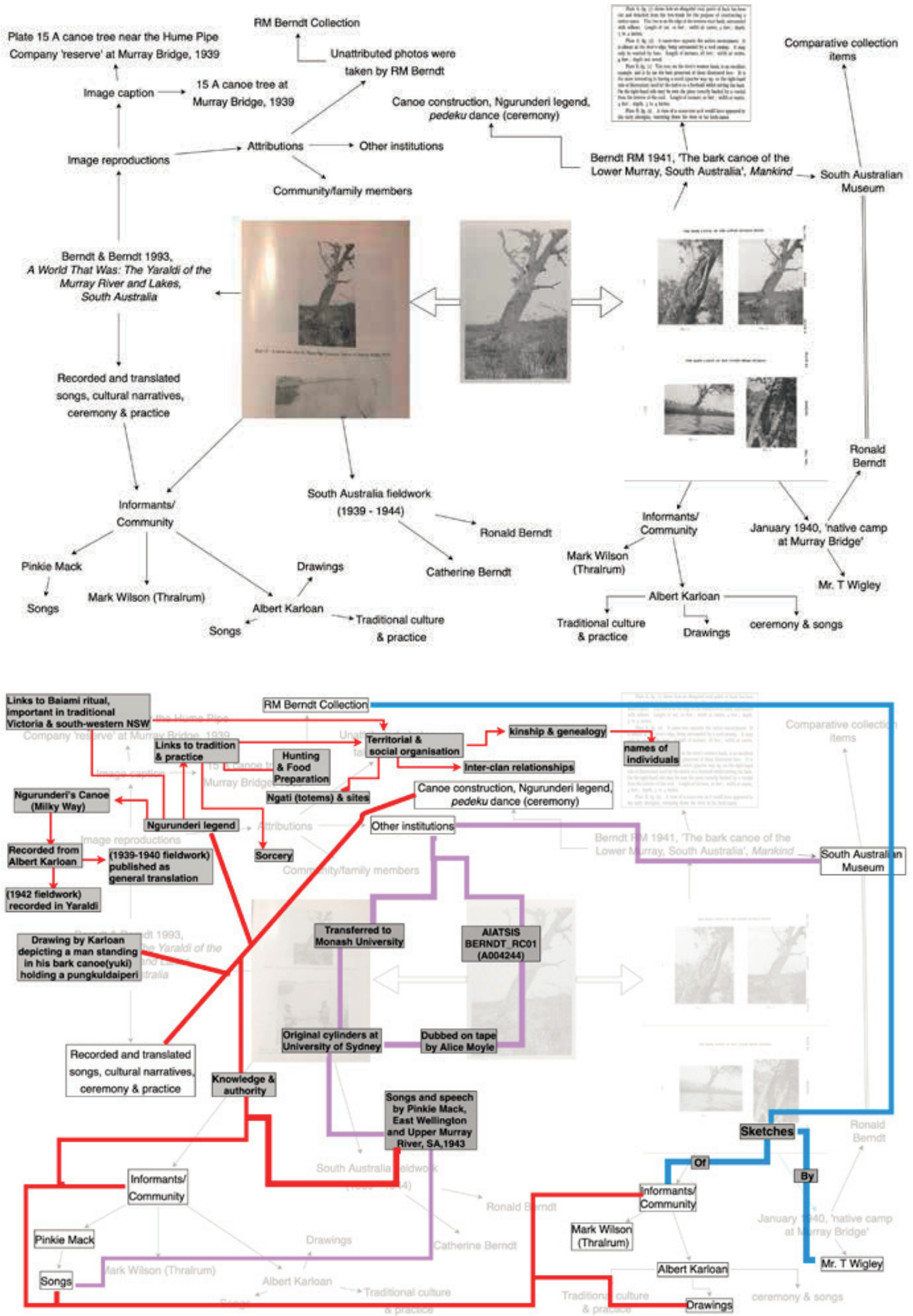

图 1 “独木舟树”照片：呈现背景分层、交叉点和关联性的示意图。图片使用得到伯恩特人类学博物馆的许可

作为信息来源之一，人类学藏品所对应的内容背景和关系框架超出“藏品”本体名称的范畴。作为信息生产要素，人类学藏品可以从潜在轨迹和关联中生成新的知识。通过“独木舟树”照片案例，可以看到重新绘制出物品以前曾经的社会生活，能从藏品或藏品之外提取更多信息并将其引入新的流通网络。重要的是，这种流通可以产生新的意义、价值和用途，而这些新的内容又能够补充、增加或挑战现有的知识层次和认知方式。

过去几十年来，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群一直与人类学藏品保持联系和互动，这强化和支持了对机构代管、监管和管理权的回收（PEERS & BROWN 2003, LYDON 2014）。在澳大利亚的人类学界看来，这些跨文化的互动被认为藏品具有重塑历史和认识同时代语境的重要意义。（GIBSON 2020）。在接触的过程中，不应忽视强加给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权力结构，持续紧张的对立可以妥善解决。人类学藏品更适合主动发挥作用，而不是处于中立的地位；与之互动可能会产生不适感，但我们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新知识在这样一个空间里生成，这与理解新知识的生成方式（认知方式）和生成过程同等重要。为了避免旧有的权力和政治等级制度在未来得到强化或被复制，这些工作奠定了基础。

对于自身不断发展的机构来说，人类学藏品在生成、认可和适应新知识方面所具有的潜能，有助于支持各个机构制定和实施战略愿景。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开始审视澳大利亚殖民历史对自身的影响，很多机构都积极制定鼓励接触、合作与和解的文化政策。围绕原住民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的协议准则，突出与知识、权利和权威相关的问题，而人类学藏品能够支持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资料来源社群来说，在获得更多访问权的同时，还以积极合作、相互交流和承认对其遗产进行托管的方式呈现，进一步推动各类相关知识的生成、组织和管理。这些主张认知、验证与包容多元形式知识的参与机制，有助于消除各种界限，并为原住民提供学术职务或专业岗位的机会，让他们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新的知识也为跨学科创造机会，从而发现此前可能遗漏或未知的信息层次和关联。对于上述机构而言，可以基于信息开展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的协作式研究调查、展览开发和公关计划。鉴于许多机构开始重视数字化和技术创新，潜在的馆藏数据也可用于呈现如何管理和共享符合道德伦理规范的数字文化遗产和知识。

结语

人类学藏品是拥有社会生活的物品，可以通过映射来重构语境与关联内容，从而活化生成新形式的知识。超出“藏品”的定义范畴，这些资料可用于访问和参与相关协作，从而同时满足当地原住民社群和机构发展时的期望。人类学领域的照片提供了视觉参考和切入点，非常适合运用这种方法，便于社群和机构从需求出发开展多认知角度的探索。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社群可以从人类学资料中提取信息，以他们的方式生成、记录和分享知识，并将新的认知融入原有藏品，从而赋予这些藏品真正的生命力。

致谢

感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供“澳大利亚政府研究培训项目”（Australian Government 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的经费支持。

参考文献

APPADURAI, A. 1986.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ed. A. APPADURA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3.

BERNDT, R.M. 1941. The Bark-canoe of the Lower River Murray, South Australia. Mankind 3 (1): 17-28.

BERNDT, R.M., C.H. BERNDT & J.E. STANTON 1993. A World That Was: The Yaraldi of the Murray River and Lakes, South Australia.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Miegunyah Press.

BENNETT, T., F. CAMERON, N. DIAS, B. DIBLEY, R. HARRISON, I. JACKNIS & C. MCCARTHY 2017. Collecting, Ordering, Governing: Anthropology, Museums, and Liberal Governme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EDWARDS, E. 2003. Introduction. In: Museums and Source Communities: A Routledge Reader, eds. L. PEERS & A.K. BROWN, London: Routledge, 83-99.

GIBSON, J.M. 2020. Ceremony Men: Making Ethnography and The Return of The Strehlow Collection. New York: SUNY Press.

GOSDEN, C. & C. KNOWLES 2001. Collecting Colonialism: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 Change. New York: Berg.

GRAY, G. 2007. A Cautious Silence – The politics of Australian anthropology. Canberra: Aboriginal Studies Press.

GRAY, G. 2019.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Were of No Value... in War Time': Ronald and Catherine Berndt and War-Time Security, 1939 – 1945. Anthropological Forum 29 (2): 116-133.

JONES, M. 2019. Collections in the Expanded Field: Relationality and the Provenance of Artefacts and Archives. Heritage 2 (1): 884-897.

JOY, J. 2009. Reinvigorating object biography: reproducing the drama of object lives. World Archaeology 41 (4): 540-556.

LYDON, J. 2014. Calling the Shots: Indigenous Photographies. Canberra: Aboriginal Studies Press.

MORPHY, H. 2020. Museums, Infinity and the Culture of Protocols; Ethnographic Collections & Source Communit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EERS, L. and A.K. Brown. 2003. Museums and Source Communities: A Routledg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PETERSON, N., L. ALLEN & L. HAMBY 2008. The Makers and Making of Indigenous Australian Museum Collections,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SCHULTZ, L. 2014. Maintaining Aboriginal engagement in Australian museums: two models of inclusion.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9 (5): 412-428.

联系方式

Ms. Siti Sarah Ridhuan, PhD candidate (Anthropology, Social Sciences, UWA)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erth, AU

Email: siti.ridhuan@research.uwa.edu.au

ORCID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4396-2608

关键词

Ethnographic collections, photographs, social lives

一项全新的人类学藏品合作研究：通过播客沟通档案馆与当地社区

Jodie Kell, Steven Gagau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Toksave：文化对话”（Toksave: Culture Talks）是由太平洋地区濒危文化数码资料档案馆（Pacific and Regional Archive for Digital Sources in Endangered Cultures，PARADISEC）制作并于 2019 年推出的播客系列节目（podcast series）。节目的受访者都是与档案馆藏品有着文化联系和个人渊源的相关人士。本文指出，播客系列节目具有研究成果的价值，能够促使原住民社群发声。此外，重新利用档案录音通过播客进行音频播放，并与社群成员进行互动，提升了可及性和检索功能。

引言

2018 年，朱迪 • 凯尔（Jodie Kell）和史蒂文 • 加高（Steven Gagau）基于太平洋地区濒危文化数码资料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资料，联手发起一个播客项目。数码资料档案馆（PARADISEC）收藏并在线提供全球许多小文化（small cultures）和语言的数字档案。朱迪拥有音频工程师和音乐学家的技能，而在档案馆工作的史蒂文则拥有原住民社群成员的身份，他们于 2019 年 11 月合作推出播客“Toksave：文化对话”，采访与档案馆资料有着个人和文化上联系的相关人士。

本文将探讨播客的制作过程，包括如何基于元数据发掘生成新的知识，以及如何利用当今新的技术，通过与原住民社群成员开展合作，实现分享和重塑档案收藏的目标。在作者与哈里斯（Harris）等人合著的前一篇论文的基础上，本文更聚焦于“Toksave：文化对话”播客系列节目，指出播客产品作为研究成果所具有的价值（HARRIS et al. 2019）。播客以录音集的形式，从档案馆收藏的人类学数字档案的某件物品切入，通过讨论原住民与这件物品有关的生活经历，以及与过去和当前的关联性，凸显原住民在文化方面的优势。我们认为，认识到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和知识传承者的价值，有可能改变档案馆的工作流程，并重新调整档案馆机构内部的权责关系。

连结与再连结

“在大家面前捧着它，我感觉像黄金一样珍贵。从心底里涌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敬畏感。因为这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东西。”（JOHNNY OBED，第 5 集：06:14—06:32）

重新联系原住民社群及其遗产是一项重要举措，是当前档案馆活动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探讨可及性的核心问题（Harris et al. 2019, 138）。对于来自瓦努阿图北部帕马岛（Paama Island）的约翰尼 • 奥贝德（Johnny Obed）来说，TC1 录音集和已故的特里 • 克劳利（Terry Crowley）出版的作品就像黄金一样珍贵。他认为收藏帕马语言的相关材料对于他的民族大有裨益。

成立于 2003 年的数码资料档案馆，旨在提供濒危文化群体的媒体档案记录。档案馆创建了档案条目、音频和视频记录、图像，以及文本的数字记录，而不只是保存实物对象。这确保了通常容易受损的过时媒介（例如卷盘磁带或盒式磁带）记录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延长寿命。在具体实践中，数码资料档案馆的目标不仅是能将资料进行数字化以长期保存，而且利用包括在线档案目录在内的新技术，重新连结相关社群的过去与现在。数码资料档案馆以目录的可检索性和可及性为特点，用户只需同意数码资料档案馆的访问条款，即可使用包括名称、地点和语言在内的关键词来搜索并在线收听、观看或下载超过 300 000 条档案。

2015 年在荷兰举行的洛伦茨中心研讨会（Lorenz Centre workshop）上，确立了 FAIR 原则（FAIR Data Principles），即可查找（findable）、可访问（accessible）、可互操作（interoperable）、可重用（reusable），这已成为包括 FORCE 11（The Futur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e-Scholarship）、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等在内的国际组织认可的准则。作为共享数据、访问管理档案收藏的框架性实践准则，FAIR 原则的重点是最大化利用和重复使用资料〔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网站（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 website），2020〕。数码资料档案馆的创始理事琳达 • 巴维克（Linda Barwick）和尼克 • 蒂伯格（Nick Thieberger）表示，档案馆的工作符合上述四项元数据管理原则，能够“让以前被封存的记录得以重复使用，（它们）由此赋予这些陈旧的录音以新的生命”（BARWICK & THIEBERGER, 2019, 139）。就播客本身而言，其内容的生产流程和最终的线上成果能提高数码资料档案馆目录的可检索性和可访问性。作为重复利用资料的一种方式，播客能让原住民社群的成员深入接触相关收藏。

重新定义研究成果

“Toksave：文化对话”播客，旨在通过与存在个人和文化上关联的人士进行交流，发挥档案更大的价值。播客的每一集都会关注不同来源的藏品，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斐济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播客系列节目于 2019 年 11 月在维吉美术馆（Verge Gallery）公开发布后，吸引了许多社群成员的参与。通过悉尼音乐学院（Sydney Conservatorium of Music）网站上的连续发布播客，极大地推动了对档案馆所收藏的历史录音的认知。

在澳大利亚，衡量本国学术研究质量的标准是由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 制定的，而这项标准又推动了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资助。自 2010 年以来，研究委员会提出了“非传统研究成果”（Non-Traditional Research Outputs，NTRO），并将其与传统研究成果一起列入审核范围。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研究方案将“非传统研究成果”定义为“通过写作、制作、作曲、设计、表演或策划等任何形式创作的可公开、可使用、可评估的研究成果”（BARWICK & TOLTZ，2017，67）。巴维克和托尔茨（Toltz）指出，与传统研究成果相比，提交非传统研究成果需要满足更高的要求。悉尼音乐学院分析了相关程序，发现非传统研究成果的提交更为耗时，而且有时很难满足研究计划的严格要求（BARWICK & TOLTZ，2017）。

播客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媒体，我们认为应当被视为非传统研究成果，播客能以创新性的方式呈现现有的认知，从而拓展研究的概念。新闻学者西奥班 • 麦克休（Siobhán McHugh）认为播客和广播节目是“精心制作的音频故事与记录”，其价值在于赋予档案资料以引人入胜的表现形式和更易于理解的管理方法，而且在学术方面也不同于传统研究成果（MCHUGH，2019）。麦克休指出，播客作为新的音频媒体形态，具有推动创新研究方法的潜力。制作人运用音频编辑和混音技术打造适合听众的全新体验，尤其注重听觉的情感因素，触动“听众的内心体验”。

这种情感特质在播客系列节目的第三集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民族音乐学家迈克尔 • 韦伯（Michael Webb）已有 25 年没有听过他于 1993 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Rabaul）附近进行田野调查时录制的音频。史蒂文 • 加高为他准备了这些录音的片段，一同探讨托莱人（Tolai）的音乐传统，而听众们也随着他们一起回顾了曾经的历程。录音的地点包括仪式活动、教堂、节日表演和人们的家里。我们听到一段音乐家安德鲁 • 米甸（Andrew Midian）的私人录音，其中还有当时他家里的声音和屋外的鸟叫声（Episode 3: 15:00—16:25）。当我们听着录音想象当时的情景时，迈克尔会在听到自己的声音后指出安德鲁在用餐后正为他演奏。录音的重要性就在于能让人切身体会其中人物的亲密关系，维系研究人员与社群的联系，让听众获得书面文本无法传达的感受。

优先关注原住民的声音

“今天的我们聆听广播，彼时的人们聆听歌声，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广播，但前辈们的歌声是如此动听。这就像一场旅行，给人身临异境的

感受。一首歌就像一个故事，每翻一页都能看到新的内容。”（LINDA TJUNGKATA ANDERSON，第 4 集：05:31—06:45）

来自中部地区西澳大利亚沙漠（Western Desert）的平图皮•鲁利加（Pintupi-Luritja）妇女琳达•琼卡塔•安德森（Linda Tjungkata Anderson）在听到她父亲诺塞普•朱普鲁拉（Nosepeg Tjupurrula）演唱传统歌曲的录音后表示，这些歌曲就像故事书一样精彩。在许多文化中，传统歌曲蕴含着口口相传的深层文化知识和内涵。殖民活动中断了文化传承，也破坏了知识的传播，由于人们更重视书面化的学术作品而不是口述传承，这就意味着原住民的知识往往被低估和忽视。

播客的音频格式可以视为从研究中获得含义的方式，既重视原住民的声音，也考虑到运用文化领域合适的研究方法。医学和社会工作学专家道恩•贝沙拉布（Dawn Bessarab）和布里吉特•恩安杜（Bridget Ng'Andu）在讨论采集“yarning”（一种原住民传统对话和叙事的方式）数据方法的重要性时表示，“土著社会有口述故事的传统特征，这是个人和群体之间传播、分享知识的主要形式。”（BESSARAB & NG'ANDU，2010，38）

他们提出，“yarning”可以让原住民受访者主导研究视角，而不是由研究人员来推动对话。这也要求研究人员和参与研究工作的原住民建立负责任的合作关系，从而确保文化安全。

Toksave 播客的案例进一步发展了上述见解，由播客编辑的“yarning”不仅是一种采集数据的方法，其本身也是一项研究成果。这种看法认识到口述传承是原住民社群教育的核心，这也体现在社群对研究成果的期待上。

合作关系而非融洽关系

制作播客的工作流程是由朱迪•凯尔和史蒂文•加高共同制定，目的要让原住民的声音得到重视。其中的核心要素是建立能保证文化安全的关系。正如工作流程图表所示，与其在采访的过程中与参与者建立融洽的关系，不如聘请其担任文化顾问并给予时间和报酬，建立长期联系，让他们的知识与藏品有更好的结合。这套工作流程是随着播客的创建而逐步发展完善的，制作人会听取参与者的意见，不断改进流程。

联合制作人史蒂文•加高拥有特殊身份，他既是档案管理员，同时也是原住民社群的成员。作为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东新不列颠省（East New

“Toksave：文化对话”播客制作的工作流程

确定一项藏品，同时评估悉尼地区是否有相关的社群成员可以参与发言。

与发言者所在社群的成员协调合作事宜，询问他 / 她是否有兴趣接受对其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料的采访。

当确定发言的社群成员同意参与时，人力资源部门会签订一份非正式的合同，聘请受访者担任文化顾问，要求提供 20 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容包括听录音和提供播客采访的元数据。

从档案文件中选择录音资料并与文化顾问共享，提出问题列表以充实元数据。

安排第一次会面，讨论针对录音资料采访的范围和意向，同时确定播客采访的日期。

一旦文化顾问对自己的认知和对录音资料的理解建立信心，播客采访就开始了。访谈可以安排在任何一个能让顾问感到放松的场所。

制作人听完所有的录音资料内容，随后确定播客的主题。撰写导语并录制。

根据档案录音资料的采访内容进行后期编辑和策划。

分享播客并请参与者审核。

将采访时的原始资料与受访者的照片或其他档案材料一起保存在 PDSC。

播客访谈通过流媒体网站在线发布，可在数码资料档案馆网站、所在大学的网站以及流媒体网站上获得。

图 1 “Toksave：文化对话”播客制作的工作流程

Britain）的托莱人，史蒂文会说库阿努阿语（Kuanua）和托克皮辛语（Tok Pisin）。他于 2018 年成为数码资料档案馆团队的一员，贡献了对新不列颠省、新爱尔兰省乃至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化和语言的了解。在澳大利亚，史蒂文是悉尼同乡协会（Sydney Wantok Association）巴布亚新几内亚社群的领袖和代表。由于他与新南威尔士州美拉尼西亚（Melanesian）社群有着广泛的联系，才让播客得以顺利问世。

播客系列节目第二集和第三集的素材源于悉尼大学民族音乐学家迈克尔 • 韦伯搜集的材料。迈克尔于 1993 年在拉包尔附近史蒂文所在的社群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田野调查。在数字化、输入和补充收藏资料元数据的过程中，档案管理员与提供方、社群成员与研究人员之间形成特别的关系。

“这些收藏不仅是我档案工作的一部分，而且与来自加泽尔半岛（Gazelle Peninsula）（新不列颠岛）的原住民有着直接联系。我们被称为托莱人（或 Gunantuna），大多数的录音都记录了我们民族 40 多年的音乐史，包括相关艺术先驱的探索、创新和创造力。我从 Viviran 村远道而来，没想到在悉尼从事档案管理员的工作，能让我再次回到 1993 年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STEVEN GAGAU，第 2 集：02:03—03:04）

史蒂文认为自己在档案馆扮演着多重角色。通过融合这些角色身份，他希望能成为连接档案馆与原住民社群的中间人（Harris et al. 2019: 145）。如图表所示，播客的整个工作流程都需要与社群成员的合作，史蒂文认为这样能更好地控制研究的方向。

音频播客这种以新技术驱动的“非传统研究成果”，正在挑战甚至动摇存在于档案馆和学术机构里的权力关系。这在与数码资料档案馆团队合著的论文里也有体现。

“因此，向发言者的社群提出咨询，并将他们视为专家的行为，不仅能够提升档案的价值，而且有可能消解殖民时期的档案所隐藏的权力结构。”（HARRIS et al. 2019: 145）

直到最近，档案馆还在将非原住民研究人员视为文化知识的“专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能创作出符合学术要求的研究成果（例如著作和论文）。随着 Toksave 播客等“非传统研究成果”的诞生和论证，能更贴近原住民社群的需求和期望，同时改变了“专家”或“学者”的定义，让人们接触到多元化的知识体系。

结语

“我们的文化只是在长辈们的心中扎根，如果在他们逝去之前传承给下一代，能让我们保留一些文化传统将是很可贵的。这段录音非常棒，请务必妥善保存。”（GRACE HULL，第 1 集：23:18—23.40）

最后，让我们引用这段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海岸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的基利维纳语（Kilivila）使用者格蕾丝 • 赫尔（Grace Hull）的话。格蕾丝与数码资料档案馆合作播客的第 1 集，并且为上述研究方法的制定发挥了核心作用。格蕾丝强调，档案馆是安全保存人类学资料的重要场所，她同时也认为人类学藏品可以成为找回文化和保留传统的一种方式。

播客作为一种产品，借助了新兴技术和新的研究方法，与原住民社群开展渐进式的接触，这有助于揭开尘封的档案，开放对人类学藏品的访问。通过优先考虑原住民自己的声音，重视他们的知识，也可视为提升原住民社群的权利，并且改变档案机构的权力结构。

参考文献

BESSARAB, D., & NG’ ANDU, B. 2010. Yarning About Yarning as a Legitimate Method in Indigenou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Indigenous Studies, 3(1), 37–50.

BARWICK, L., & THIEBERGER, N. 2018. Unlocking the archives.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BARWICK, L & TOLTZ, J. 2017, Quantifying the Ineffable?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s 2014 Guidelines for Non-Traditional Research Outputs, Lexington Books (Rowman & Littlefield).

HARRIS, A., GAGAU, S., KELL, J., THIEBERGER, N., & WARD, N. 2019. Making Meaning of Historical Papua New Guinea Record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uration, 14(1), 136–149.

KELL, J. & GAGAU, S. 2019 Toksave: Culture Talks. Podcast series, PARADISEC, Sydney. https://www.paradisec.org.au/toksave-podcast/ (accessed October 12, 2020).

MCHUGH, C. 2009. Beyond Journal Articles: Navigating the NTRO (Non-Traditional Research Outcome), Flow Journal: A Critical Forum on Media and Culture. Australia. April 27, 2019. https://www.flowjournal.org/2019/04/beyond-journal-articles/ (accessed October 22, 2020)

PARADISEC website. The Pacific and Regional Archive for Digital Sources in Endangered Cultures. Toksave – Culture Talks. https://www.paradisec.org.au/toksave-podcast/ (accessed October 22, 2020)

The FAIR data principles: ANDS working with data. From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 website. https://www.ands.org.au/working-withdata/fairdata (accessed October 20, 2020)

Throughout this paper we have directly referenced the voices of the podcast interviewee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from Indigenous community members. All episodes are accessible at https://www.paradisec.org.au/toksave-podcast/

联系方式

Jodie Kell
Laboratory Coordinator, PARADISEC Sydney Uni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NSW 2006 Australia
Email: Jodie.kell@sydney.edu.au
https://www.sydney.edu.au/music/about/our-people/academic-staff/jodie-kell.html

Steven Gagau
Research Support, PARADISEC Sydney Uni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NSW 2006 Australia
Email: steven.gagau@sydney.edu.au
https://www.sydney.edu.au/music/about/our-people/academic-staff/steven-gagau.html

关键词：

Digital archive, podcast, research, Indigenous, collaboration

通过调解解决博物馆涉及的文化财产争端

Helen Shurven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博物馆和其他实体或个人因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而产生的争端，一般是较难处理的问题。调解是一个关注所有当事方利益的过程，在调解人的协助下寻找解决之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调解还能推动博物馆针对文化财产的争端制定相应政策。有鉴于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都支持通过调解来解决文化财产争端。

博物馆与其他实体或个人的文化财产争端在当下甚至在未来都是有争议的话题（参见案例，ROBERTSON 2019）。本文将文化财产较为宽泛地定义为“易受经济评估影响，并且……可在国际贸易中进行交易的可移动文物”（FRANCIONI 2011, 1）。

通常来说，文化财产争端主要围绕相关财产的“所有权”（ownership）或使用权、访问权和管理权。本文的观点是，与其围绕各种权利采取对抗性的法律手段（例如仲裁或法院诉讼），不如让当事各方基于以下因素进行调解，通过谈判协商以求达成共识：

- 财产的文化背景（例如，可知的起源）；
- 财产的精神脉络（例如，蕴含的意义，以及对谁产生意义）；
- 环境背景（例如，将其带离原产地是否会产生任何后果）；
- 商业背景（例如，是否具有可估测的商业价值，以及可能的计算方法）；
- 应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相关者后代的权益；
- 调解是一个过程，由一名或多名专业人士协助解决两个或多个当事方之间的争端：
- 确定存在争议的问题；
- 探讨问题；
- 提出解决争议的选项；
- 就上述选项进行谈判并考虑其他方案；
- 努力就全部或部分争议达成一致。

许多文化财产争端均涉及多个当事方和利益相关方，调解是非常适合用于解决多方争端的公正程序（SHURVEN 2014）。当事方可以包括直接受到影响并与文化财产有着直接利益联系的个人或群体，利益相关方则是指与争议本身和解决结果存在间接利益联系的人士（例如参观博物馆的社区成员或博物馆会员）。

调解被认为是能有效解决争议的潜在工具之一，可以适用于个人或组织因文化财产而发生的争端。奥唐奈（O’DONNELL）指出（2011, 7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或归还非

法占有的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Promoting the Return of Cultural Property to its Countries of Origin or its Restitution in Case of Illicit Appropriation）“已将调解与和解视为其任务之一”。调解程序与规则由委员会制定。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委员会可以帮助解决双方和多方之间的文化财产争端，但其作用通常仅限于咨询，提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尽管如此，各方还是可以通过私下协商或由上述委员会或组织（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安排调解，达成协议并同意接受调解程序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博物馆正在制定政策，以更好地指导相关的考量与运作（SARR & SAVOY 2018）。媒体上也有相关的报道，例如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古代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Ancient Cultures）的馆长正在制定一项“自愿将非法文物归还原有国的新政策”（The Australian 2019，3）。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相关准则和指导方针。举例来说，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的《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就“为博物馆及其工作人员设定了专业工作和表现的最低标准”，其中的第 2.5 条涉及敏感的文化物品，第 6.2 条则涉及文化财产返还，相关内容包括“博物馆应准备启动与文化财产来源地的国家或人民关于返还文化财产的对话。文化财产返还应基于科学、专业和人权准则，依据当前适用的地方、国家和国际法规，以公平的方式进行，最好是在政府或政治层面进行。”

可以说，博物馆处理文化财产争端的方法将影响到博物馆的声誉、各当事方和利益相关者的约定，乃至今后针对类似争端的处理。文化财产的争端可能比较复杂，法律制裁也可能难以实现或并不适用（例如已经超出法定期限）。最近有一份关于文化财产问题的报告，其中题为“政治审慎与博物馆焦虑”的一章中这样写道：“即使在今天……仅仅提到‘返还’一词就会引起防御性的条件反射和回避性的心理，这是依然存在的事实”（SARR & SAVOY 2018, 16）。

相关机制的制定，例如《华盛顿原则》（Washington Principles），即是在1998年举行的关于大屠杀时代资产问题的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 on Holocaust Era Assets）上通过的。其中第 8 条原则提到相关语境的重要性并指出“……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来实现公正和公平的解决办法，同时要认识到——取决于围绕个案的实际情况与形势——解决办法可能会有差异”。这些原则今天仍然适用，包括德国失落艺术品基金会于 2018 年举办的“《华盛顿原则》20 年：未来路线”专家会议上再次获得认可，鉴于公平公正的结果对所有当事方和利益相关方都是至关重要的，上述原则也适用于更广泛的文化财产争端。博物馆正试图采用一种公平公正的方式来寻找解决这些争端的途径。汤普金斯（TOMPKINS）和高曼斯（GOMMANS）（2016, 66）（两人分别为法官和律师）指出，即使依据《华盛顿原则》，各方要想通过法庭来采取行动以解决文化财产的争端，也会遇到种种障碍，他们敦促“诉讼应被视为最后的手段”。

为了能就文化财产争端达成可持续的协议，需要采用公平公正的立场，包括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尽量维护各方之间的关系。通过调解可以鼓励博物馆和其他各方在维持相互关系和尊重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和解。为了能提出有意义的解决方案，需要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包括文化、精神、环境、商业和代际传承等。此外，不论是部分或全部解决了争端，这些结果都能对存在着间接关系的利益相关者产生积极影响。如前所述（FORREST 2010, 162），“文化财产是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因而能在促进世界各国之间文化理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推动文化包容、相互理解和国际和平”。

参考文献

FORREST, C. 2010.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FRANCIONI, F. 2011. The Human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Law: An Introd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 1: 9–16.

O’DONNELL, T. 2011. The Restitution of Holocaust Looted Art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The Perfect Storm or the Raft of the Medus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 1: 49-80.

ROBERTSON, G. 2019. Who Owns History?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SARR, F & SAVOY, B. 2018. The Restitution of African Cultural

Heritage: Toward a New Relational Ethics (Translated by Drew S. Burk) Franc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SHURVEN, H. 2014. Multi-party mediation: Complexities and Strategies. Australasian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25: 166-171.

THE AUSTRALIAN. 2019. Article by Ashleigh Wilson. Aussie uni finds final piece in puzzle sparked by theft on the Nile. 11 April, 3.

TOMPKINS, A & GOMMANS, L. 2016. Resolving Nazi-era looted art disputes by ADR processes.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Bulletin 3, 4: 66-72.

联系方式

Helen Shurven BAHons(Psych) MEd LLB, Doctoral student - Murdoch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Accredited Mediator; Member Australian Dispute Resolution Advisory Council; Mediation & Arbitration Panel Member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

E-mail: hshurven@gmail.com

关键词

mediation, cultural property, museums

日本理工类大学博物馆的实物交互实践

Sayuri Tanabashi（棚橋 沙由理）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当今社会面临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日本的高等教育界正在努力解决相关问题。大学博物馆的教育和研究应如何发展，才能涵盖从传统到前沿的一系列知识？本文介绍的来自两所大学的 3 个项目，让学生利用大学博物馆的藏品和实物开展跨学科的学术互动。这些案例都证明了使用 3D 打印制品、可运作纺织机或锦绘（nishiki-e）等学术性实物，采取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Object-based learning），能够促成具有重要价值的跨时空互动与交流。

引言

当今社会正面临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自 2015 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来，日本的高等教育界正在努力解决相关问题。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共有 17 条，其宗旨包括消除贫困和饥饿，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实现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维持社会和平等。目前，日本的大学正在共同开发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教育和研究计划。这些计划的关注重点，包括如何通过小组合作的主动或体验式学习和实践来共同解决地方和全球层面上的问题。作为过去和现代知识的交汇点，大学博物馆应当如何推动实现教育和研究计划？

大学博物馆有两个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特点。首先，大学博物馆更适合检验博物馆学的理念。这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教育和研究机构（类似于大学内部的院系）。其次，大学博物馆提供给大学教授、策展人、图书管理员等专业研究人士使用，专业人士可以利用博物馆的藏品和空间开展跨学科教育和研究。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大学博物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推动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 （object-based learning，OBL）的发展，促进横跨过去和现在的跨学科知识互动，并面向未来（LOURENÇO, 2008; SIMPSON et al., 2019） 。

有学者指出，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能够有效连接高等教育领域内和领域外的多样化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CHATTERJEE 2010, SIMPSON & HAMMOND 2012）。查特吉（CHATTERJEE）等人（2015）阐述了博物馆运用基于实物对象学习方法的发展脉络，指出相关理念源于教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科学教育和博物馆教育学等学科领域（PARIS 2002）。

最近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领域运用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方法产生浓厚兴趣，认为这是 21 世纪开创的跨学科学习和教学的全新领域（SIMPSON 2014, THOGERSEN et al. 2018）。人们已经注意到，基于对象的学习能够同时利用实物对象和数字替代资源，在大学课程中产生更好的教学效果（KADOR et al., 2018; SIMPSON et al., 2013）。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大学博物馆及其馆藏支持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方法。

此外，辛普森（Simpson，2019）指出基于对象的学习方法在视觉素养、非成熟素养、描述性（语言）素养、沟通技巧、比较分析和谈判技巧等方面的效果。其支撑的理论依据包括传统的多感官参与、具身和体验式教学法、建构与涵义创造，以及多样性的学习环境等（FALK & DIERKING 2000，KOLB 1984）。

本文将探讨日本两座具有代表性的国立理工大学博物馆的策展活动，并针对来自这两座博物馆的 3 个案例进行研究。科学与工程技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本文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利用学术性实物对象推动大学教学的跨学科互动。

1. 东京工业大学的案例研究

东京工业大学（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okyo Tech）是一所拥有 6 个本科和研究生学院的理工类大学，包括科学、工程、材料与化工、计算机、生命科学与技术、环境与社会等专业。与其他许多大学一样，东京工业大学开展有助于提升人类智慧的研究。大学拥有值得自豪的历史，包括 130 多年来为日本的制造业和先进工业开拓道路。大学最早的前身是东京职工学校（Tokyo Vocational School）。学校由德国科学家戈特弗里德 • 瓦格纳（Gottfried Wagener）与日本的教育博物馆（Museum of Education）和教育部的几位成员共同创办于明治时期。1881 年学校成立，最初的目标是将科学理论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在日本工业现代化的时期，学校于 1890 年更名为东京工业学校（Tokyo Technical School），1901 年再次更名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Tokyo Higher Technical School）。在那之后学校定名为东京工业大学（英文名一度为 Tokyo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直至 1946 年获得国立大学资格。从那时起，东京工业大学发展成为日本著名的理工类大学（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8）。

东京工业大学的博物馆和档案馆展出了大学校史上与教学和研究活动有关的藏品。博物馆建成于 1987 年，建设目标是展出百年纪念堂里的藏品。迄今为止，博物馆已收藏超过 10 000 件与制造业和先进工业有关的内部藏品，种类范围从民间陶瓷艺术品、现代主义建筑模型、全息艺术，到诺

贝尔奖获得者的相关资料等。此外还包括与工业成就有关的藏品，例如铁氧体的发现、维生素 B2 的化学合成，以及电光技术等。

案例 1：基于 3D 技术打印自噬细胞的实物对象学习

第一个案例是科学工作室的人造细胞项目。自噬是一种常见的细胞现象，被认为是真核细胞为维持健康而降解自身结构。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因在细胞自噬机制方面的发现，获得 2016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了呈现大隅教授的发现，博物馆在展出单色和平面图片以外，还采用了立体和彩色的信息图表，在没有活细胞成像的情况下辅助说明亚细胞系统。在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帮助下，博物馆制作了 3D 打印的自噬细胞模型。同时概述自噬机制（NAKATOGAWA et al., 2009），并构建细胞内结构的 3D 数据用于打印。自噬形成杯状双膜结构，在细胞质成分周围形成完整的包膜。双膜结构即所谓的自噬小体融入液泡中，细胞质成分被降解和回收。自噬机制分为五个阶段，重点展示每个阶段的特征和运动。借助应用彩色透明材料的 3D 打印技术，最终可以完成自噬各个阶段的 3D 模型制作（图 1；TANABASHI,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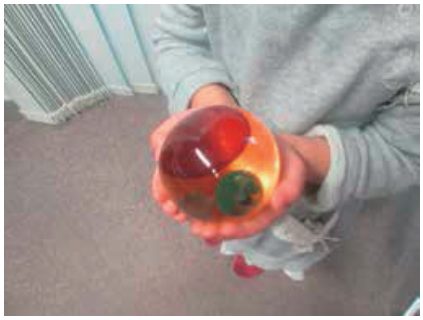

图 1 儿童手中逼真的 3D 打印自噬细胞。S• 田桥（S.Tanabashi）拍摄

随后，博物馆为 4~11 岁的儿童举办讲习班，这些儿童大多对细胞生物学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要真正详细了解自噬机制是非常困难的，毕竟这属于大学的高等教学课程。然而，孩子们能够通过观察 3D 打印的自噬细胞模型，探讨细胞质成分的相互作用，并且按照各个阶段正确排列不同的模型。最终，通过生动逼真的自噬细胞 3D 打印模型，孩子们了解到深奥的细胞内运动并获得了可贵的博物馆体验。

2. 东京农工大学的案例研究

东京农工大学（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TUAT）是一所拥有农学和工学 2 个学院的理工类大学。大学开展的各项研究旨在丰富人类的物质生活。回顾历史，东京农工大学在建校 140 多年的时间里引领日本蚕桑和纺织行业的发展。农工大最早的前身是 1874 年（明治 7 年）设立的日本内务省劝业寮内藤新宿派出所农事修学场（Naito-Shinjuku Branch Office of the Industrial Encouragement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其农学部和工学部的前身分别是东京农林专门学校（Tokyo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和东京纤维专门学校（Tokyo Textile College），两所学校于 1949 年合并为国立大学并更名东京农工大学。最初两个学部的研究方向是农学和纤维学，纤维学部于 1962 年更名为工学部。目前，东京农工大学已成为日本著名的理工类大学（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2020）。

与东京农工大学教学和研究活动相关的历史藏品均在其自然科学博物馆（Nature and Science Museum）展出。博物馆最早源于 1886 年创设的日本农商务省蚕病实验室的参考品陈列室。从那时起，博物馆陆续收藏了超过 13 000 件与养蚕业和纺织工业有关的内部物品，范围覆盖从蚕蛹或蚕茧标本和各种纤维，到机械化的织机。

图 2 动力驱动纺织机。左后方为丰田 G 型无间歇换梭式自动织机，右侧为日产（Nissan）HR-2 型自动缫丝机。S• 田桥拍摄

案例 2：基于可动态运作纺织机的实物对象学习

第三个（译注：应为第二个）案例关注的是与技术创新有关的纺织机的运作，这同时作为特殊工程讲座内容的一部分。纺织机械至今仍在纺织工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自动织机和缫丝机更是代表日本机械创新史的大型实物。

况且，这些纺织机械还有助于从原理到应用层面理解机器的运作，其构成体现了从基础技术发展到先进技术的过程，诸如从齿轮到计算机的应用，许多汽车公司就是从纺织机械公司起步的。具体来说，例如丰田（Toyoda）G 型无间歇换梭式自动织机（無停止杼替式豊田自動織機 G 型）和日产（Nissan）HR-2 型自动缫丝机（ニッサン自動繰糸機 HR-2 型），作为可操作的展品（图 2）。这两种机器都是昭和时期由日本首先发明，后在全世界广泛使用。

第一台机器发明于 1923 年，具有很多创新功能。例如当纺线用完时会自动供线，当纺线断线时会自动停止。第二台机器于 1954 年研制成功，能全自动完成从煮茧到抽丝的整个过程。一些博物馆会以静态的方式展示这些机器，很少有能够动态展示的。我设计的展览，将纺织机作为展品陈

列在博物馆，诸如生物医学工程、应用化学、应用物理和化学工程、机械系统工程、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都能接触到这些由本校校友制造的可运作的实物。首先，在教授、策展人、退休工程师、校友等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让学生通过操作展品，了解日本纺织工业的历史。工作人员指导学生如何操作和维护每一台纺织机。此外，工作人员还要与学生讨论制作学术海报巡展的内容。在准备海报巡展的过程中，我们阐释了发明先驱的理念。海报巡展是一种主动学习的方式，学生们制作学术海报，开展小组讨论，得以与前辈进行跨代互动。作为项目的内容之一，学生通过讨论海报内容获得重要的博物馆体验。可以看出，这种体验不仅传达了有形的机械知识，同时也在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学生的共同参与下，激励了无形的远大理想。

案例 3：基于有关科学内容的锦绘的实物对象学习

第三个案例是艺术绘画的策展课程。博物馆收藏了 400 多幅精美的彩色套印浮世绘，称为“蚕织锦绘”（San-shoku Nishiki-e，蚕織錦絵）。“蚕织”（San-shoku）在日语中与养蚕有关。17 世纪出现的浮世绘，是一种描绘日本人生活的彩色绘画艺术形式。“锦绘”特指色彩鲜艳的浮世绘。蚕织锦绘生动展示了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期蚕桑业的多个步骤。这些彩绘一直是观众关注的重点（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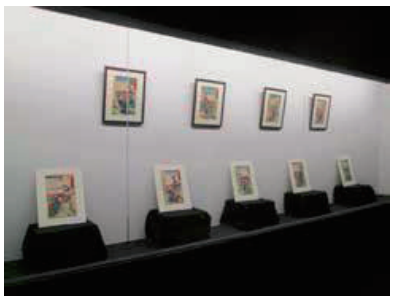

图 3 描绘江户时代到明治时期养蚕方法的科学制造锦绘。S• 田桥拍摄

蚕织锦绘同时具有学术性、艺术性两个特征，叙述了桑叶养蚕、草房结茧和丝绸加工的完整景观。可以说，蚕织锦绘同时体现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的不同方面，观众对此很感兴趣。通过一项以蚕织锦绘作为博物馆展品的试验中，来自诸如历史学、蚕桑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化学和计算机等各专业的学生，都能持续地开展跨学科学习。首先，教授和策展人等博物馆工作人员会通过展品让学生了解日本养蚕的历史。学生可以从自身专业出发，对蚕织锦绘进行调查研究并相互探讨。此外，学生们还需要基于调查成果为展览制作展板。展览准备工作类似于博物馆的策展实践，为学生提供大量接触展览设计、职业道德和策略方法的机会（SAND et al., 2017）。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学生策展人还要讨论以获得重要的博物馆工作经验。最后，学生将反思和评估博物馆策展实践的任务，通过学术上的互动来加深他们对内容的理解。

讨论

本文探讨了日本两所理工类大学的博物馆中采用的 3 种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实践。案例研究都利用了实物对象：（1）生动逼真的 3D 打印自噬细胞；（2）可动态运作的纺织机；（3）有关科学内容的锦绘。除了利用真实的学术类藏品和物品以外，这些实体物件还吸引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每所大学不同专业学生的参与。案例的共同特点是学生们基于藏品和物品进行交流和探讨。另一方面，这些案例也反映了所在大学的特点，例如东京工业大学一直在推动日本前沿研究的发展，而东京农工大学则比较重视其历史和传统。因此，东京工业大学使用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制作了生动的 3D 打印细胞。与之相对，可动态运作的纺织机械和有关科学内容锦绘得以精心保存，也符合东京农工大学超越时空的理念。

由于学生之间基于实物对象的互动，每个项目都获得了成功。这种互动能够支撑各种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课程是为理工类大学学生开设的，但今后针对文学或艺术学专业学生规划和实施这类课程，将会是推动进一步研究的令人感兴趣的路径。毕竟除了科学和工程以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技术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不可或缺的。展望未来，这项研究将纳入高等教育部门针对科学 / 艺术学的规划，以真正的学术性物品作为基于实物学习的对象。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不仅能够丰富知识，还能培养博物馆技能与学术素养，显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学生可以调动多感官参与，利用视觉、听觉和触觉来控制和操作物品。期待科学和工程学科不同领域的学生可以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壁垒，一同进行研究。我们建议，通过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方法连接从传统到前沿的各个知识领域，并且促成跨学科的对话。大学博物馆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中心。因此，本文强调在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方法中，利用真正的学术性物品作为物证，能够激活跨越时空的互动与对话。为了进一步探索和分析这种方法的影响，未来应开展更多的案例研究。

致谢

本研究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青年科学家补助金（Grant-in-Aid for Early-Career Scientists）的支持（资助号：20K13253）。

参考文献

CHATTERJEE, H. J. 2010. Object-bas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pedagogical power of museums. Proceedings of the 9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ICOM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179–182.

CHATTERJEE, H. J., HANNAN, L. & THOMSON, L. 2015. An introduction to object-based learning and multi-sensory engagement. In CHATTERJEE, H. J., HANNAN, L. (Eds.), Engaging the senses: object-bas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Routledge, London, pp. 1–20.

FALK, J. D. & DIERKING, L., D. 2000. Learning from museum: 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AltaMira Press, Lanham, MD.

KADOR, T., HANNAN, L., NYHAN, J., TERRAS, M., CHATTERJEE, H. J. & CAR NALL, M. 2018. Object-based learning and research-based education: Case studies from the UCL curricula. In DAVIES, J. P. and PACHLER, N. (E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UCL IOE Press, London, pp. 157–176.

KOLB, D. A.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FT Press, Englewood Cliffs, NJ.

LOURENÇO, M. C. 2008. Whe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knowledge meet: an overview of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n Europe. Museologia Scientifica Memorie 2: 321–329.

NAKATOGAWA, H., SUZUKI, K., KAMADA, Y. & OHSUMI, Y. 2009. Dynamics and diversity in autophagy mechanisms: Lessons from yeast.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10: 458–467.

PARIS, S. G. 2002. Perspectives on object-centred learning in museums. Routledge, London.

SAND, A., THOMS, B., DAVIS, E., PUMPHREY, D. & KINKEAD, J. 2017. Curating exhibitions a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CUR Quarterly 37: 12–17.

SIMPSON, A. 2014. Rethinking university museums: Material collections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f higher education. Museums Australia Magazine 22: 18–22.

SIMPSON, A. 2019. Object-based learning; Past paradigms and manifold modalities. Book of Abstracts, UMAC Tokyo Seminar, University museums as cultural common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museums: 11.

SIMPSON, A., FUKUNO, A. & MINAMI, H. 2019.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1: 8–10.

SIMPSON, A. & HAMMOND, G.2012. University collections and object-based pedagogies.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5: 75–82.

SIMPSON, A., HAMMOND, G. & MCKENZIE-CLARK, J. 2013. Museum literacy that is virtually engaging.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6: 59–66.

TANABASHI, S. 2019. Challenge for the future in the university museum of Tokyo Tech.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1: 99.

THOGERSEN, J., SIMPSON, A., HAMMOND, G., JANISZEWSKI, L. & GUERRY, E. 2018. Creating curriculum connections: A university museum objectbased learning project.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34: 113–12.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8. Overview. https://www.titech.ac.jp/english/about/overview/pdf/overview_201809_2.pdf (accessed October 7, 2020).

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2020. TUAT Guidebook 2020-2021. http://web.tuat.ac.jp/~intl/download/2020-2021_TUAT_guidebook_en.pdf (accessed October 7, 2020).

联系方式

Sayuri Tanabashi,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Nature and Science Museum

Address: 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2-24-16, Nakacho, Koganei, Tokyo 184-8588, Japan

E-mail: sayuri.m.tanabashi@gmail.com

https://researchmap.jp/cent.titech.ac.jp

关键词

interdisciplinarity, object-based learning, academic interac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museum

Copyright © International ICOM Committee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umac.icom.museum

Graphic edition: Gina Hammond

ISSN 2071-7229

Each paper reflects the Author's view. Images accompanying articles are included courtesy of the Author. Any additional accreditation details accompanying supplied images are as provided by the Author.